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序格局

苏祥 著



武汉

2017年乐山师范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序格局

苏祥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序格局/苏祥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307-17625-6

I.中… II.苏… III.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中国 IV.D6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2829号

责任编辑:程牧原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4.25 字数:204千字 插页:1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7625-6 定价:46.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论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相关文献研究述评	3
三、研究方法	22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23
第一章 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序格局	27
第一节 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历史：差序格局	27
一、第一阶段：1951—1977年	28
二、第二阶段：1978—2008年	30
第二节 社会保障制度差距格局的三个视角	33
一、社会保障制度差序格局之城乡差异	35
二、社会保障制度差距格局之单位差别	44
三、社会保障制度差序格局之阶层差别	52
第三节 数据来源、变量与分析方法	57
一、数据来源	57
二、变量	58
三、分析方法	62
第二章 社会保障差序格局之城乡差别	65
第一节 社会保障城乡差别的描述分析	66
一、户籍性质与社会保障	66

二、政治资本与城乡社会保障	68
三、人力资本与城乡社会保障	73
第二节 社会保障城乡差别的回归分析	75
一、户籍性质与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别	76
二、政治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别	82
第三节 三大社会保险城乡差异比较	90
一、两种资本与三大社会保险城乡差异的描述分析	90
二、政治资本、人力资本与三大保险获得城乡差别的 回归分析	100
本章小结	121
第三章 社会保障的差序格局之单位差别	123
第一节 社会保障单位差别的描述分析	123
一、社会保障与公私单位	123
二、政治资本与公私单位的社会保险	124
三、人力资本与公私单位的社会保险	127
第二节 社会保障公私单位差别的回归分析	132
一、模型的拟合优度评估	133
二、政治资本、人力资本与公私单位社会保障	135
三、公有各单位间社会保障的差异	139
第三节 三大社会保险的单位差别	143
一、公私单位三大社会保险覆盖	143
二、公私单位养老保险获得的回归分析	157
三、公私单位医疗保险获得的回归分析	161
四、公私单位失业保险获得	165
本章小结	170
第四章 社会保障差序格局之阶层差别	172
第一节 社会保障的阶层差别描述	173

一、阶层等级与社会保障·····	173
二、三大社会保险的阶层差异·····	178
第二节 各阶层等级与社会保险获得·····	183
一、模型拟合优度评估·····	184
二、回归结果分析·····	186
第三节 三大社会保险与阶层结构·····	190
一、养老保险与阶层等级·····	190
二、医疗保险与阶层等级·····	193
三、失业保险与阶层等级·····	197
本章小结·····	200
第五章 研究总结与近十年中国社会保障发展·····	203
第一节 研究总结·····	203
一、市场转型中人力资本在社会保障再分配中的效用·····	203
二、市场转型中政治资本在社会保障再分配中的效用·····	205
三、简要总结·····	206
第二节 近十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与“不变”·····	207
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近十年的变化·····	207
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变”·····	209
参考文献·····	211

导 论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引起中国社会全面变化，改革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总体性社会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迅速解体^①，以往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以及组织资源集中合于政府的状态逐渐瓦解，在社会转型中出现了两个市场——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的出现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调整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催生了各种新职业和新的社会群体；而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促进了社会流动，改变了以往的收入分配机制，扩大了社会分化，形塑了一个与计划经济时代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

经济改革加深了中国社会不平等程度，改变了社会阶层结构。改革前中国社会不平等程度很低，1979年全国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是0.33，1988年上升到0.382，1994年达到0.44，2005年不低于0.5^②。这种社会分化甚至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断裂社会的形成^③，同时也导致社会分层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1950年)，中央政

① 孙立平、李强、沈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近中期趋势与潜在危机》，见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② 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9~70页。

③ 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府以文件形式公布了当时的十三个阶级类别^①。后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城市与乡村社会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资源的分配依赖于一套严格的身份制度——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工人区分的档案制度、干部级别制度。这套制度体系塑造了1979年以前计划经济时期“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阶层结构，即工人和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群体。1979年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导致社会利益分化急剧加大，既有群体在改革中得益，也有群体在改革中利益受损^②。如工人阶层就成为典型的利益受损群体，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产业工人位于十大阶层的第八位，而失业工人更是位于十大阶层中的最底层^③。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主要源于经济改革导致的分配方式的变化。收入分配包括初次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收入。在经济改革之前，收入分配在再分配权力控制下依赖于以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为核心的身份制度，社会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福利待遇而非经济收入上^④。随经济改革而出现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导致不仅再分配权力在各阶层经济收入上继续发挥作用，同时人力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也逐渐凸显。这种收入分配方式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初次收入分配上，也体现在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上。

为配合经济改革和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中国社会保障体制变革自1979年后也在不断调整与变革。改革之前，中国建立起以身份为基础、相互分割的三种社会保障体制，即由国家保障制、单位

① 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② 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2~119页。

③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页。

④ Parish, W. L.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Watson, J.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84-120; Whyte, M. K.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65, 1975, pp. 684-771.

保障制和乡村集体保障制三种相互封闭、脱节板块组成的社会保障模式，其中城镇单位保障最全且水平最高^①。改革之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单位保障制和国家—社会保障制两个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并存的格局，其中城镇居民中就业于国有单位的保障程度最高。

尽管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近 30 年来不断调整，但改革前社会保障旧体制仍继续发挥作用，如干部的社会保障待遇仍然由国家提供，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仍旧存在差异等。各阶层在经济改革期间通过社会保障所获得的再分配收入，仍然具有较大的不平等性。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分层的机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究竟对社会分层结构有着怎样的影响？哪些因素影响了人们获得再分配收入的多寡？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本研究将在市场转型理论视角下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展开分析，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二、相关文献研究述评

根据研究主题，本研究对相关文献研究述评从两个学科——社会学和社会保障学展开。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主题，社会学的 107 个分支都会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分层展开讨论，以中国社会分层为主题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依循本研究主题，我们将以“中国经济改革”为主题的相关市场转型理论研究作为社会学相关文献述评的主要线索。

（一）市场转型理论及其相关争论与发展

关于中国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关系的讨论，发轫于 1989 年倪志伟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的论文《市场转型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该论文发表后，诸多争论围绕转型经济中再分配权力

^① 郑功成：《从企业保障到社会保障——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发展》，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 年，第 11 页。

及其收入回报展开，各种不同理论观点也随后被提出来。

1. 倪志伟的市场转型论

倪志伟 1989 年发表的论文分析了厦门农村地区 1985 年的户均收入结构，该论文可以用一个假定、三个论题、十个推论、两个一般性假设来概括它的内容。

倪志伟所做的假定是，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与之相联系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分层机制。倪志伟的这一假定受波兰尼(Karl Polanyi)和泽林尼(Ivan Szelenyi)的影响。波兰尼曾对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做出三种类型划分，即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市场经济的特征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建立横向联系，价格和货币是联系中介。再分配经济的特征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没有横向联系，中央按照纵向网络中的权力关系从上而下地对产品和剩余进行再分配。泽林尼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再分配经济，并有其一套独特的与再分配经济相适应的分层机制。拥有再分配权力是获得精英阶级地位的必要条件，没有再分配权力则表明被抛弃在精英阶层之外。

从波兰尼和泽林尼的观点出发，倪志伟提出，向市场经济转型将从根本上改变再分配经济中以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他提出了三个论题来概括市场转型后的社会分层机制。

第一个是市场权力论题。如果生产者的剩余产品由市场交换而非再分配权力来配置，将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控制资源的权力会更多地存在于市场交易中，较少地存在于再分配系统中；第二种情况，当劳动力和商品价格以买卖双方的契约为基础，而非通过行政手段来确定，直接生产者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交换的权力会扩大。因此，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伴随着权力基础的转移，即权力从再分配官僚转移到从事市场交换的直接生产者一方，这意味着对直接生产者的经济回报将高于再分配者的回报。依据这一命题，倪志伟导出三个假设。假设 1：由再分配向市场协调的转型导致社会经济获得过程的改变，相对于再分配而言，直接生产者收益更多。假设 2：国家社会主义中市场交换取代再分配机制越是彻底，政治资本相对市场经济就越贬值。假设

3: 经历了由官僚协调向市场协调的过渡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中, 再分配者在涉足私有企业经营中无任何优势。

第二个是市场刺激论题。因为市场经济中直接生产者有权力处理自己的产品和劳动力, 与再分配经济中的劳动者相比, 市场经济中的直接生产者获得的经济刺激更强烈, 他们能更多地分享剩余产品。由于劳绩与报酬相关, 劳绩又与人力资本的优劣、多寡相关, 因此, 市场刺激论题意味着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的提升, 对政治资本的经济回报的下降。在这一论题下, 有两个假设。假设 1: 对男女两性而言, 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都会增加教育对家庭的价值。假设 2: 类市场经济中, 文化资本对家庭收入有正向影响。

第三个是市场机会论题。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是再分配经济让位于市场经济的过程, 这预示着向上流动的机会结构从再分配体制的独霸向市场体制的偏向的转变。这一论题下, 有五个假设。假设 1: 邻近城市的程度对农民家庭收入的正向影响, 在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比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要高。假设 2: 由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强化市场邻近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假设 3: 由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的转型增加社区教育的投入; 假设 4: 在多样化的商品经济中人均占有土地的多少对家庭收入的影响趋弱。假设 5: 在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中, 大量人口外流的历史对村庄中个体家庭收入有负面作用。

倪志伟在论文中明确表述了两个一般性假设。第一个假设是权力贬值, 即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第二个假设是人力资本升值, 即市场转型将提高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关于政治资本贬值的假设, 他的发现是, 在人力资本和家庭组成因素一致的情况下, 时任干部家庭收入低于一般农户。与企业家家庭相比, 时任干部家庭、离任干部家庭, 其家庭收入水平与企业家家庭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关于人力资本升值的假设, 他有两项发现。第一, 市场改革后夫妻合计的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正向的, 且具有统计显著性; 第二, 市场改革刚刚开始 1980 年, 尤其是改革前的 1975 年, 夫妻的教育总和对家庭收入

的影响是负向的，即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低^①。

市场转型论发表之后，倪志伟分别在1991年和1996年对其进行修正。1991年，倪志伟对1985年福建农村调查进一步做出分析，提出“局部改革”的观点，强调在改革尚未完成之前，由于再分配体制仍然发挥作用，所以政治权力不是一夜之间贬值，而在局部改革中仍然得到相当程度的经济回报^②。在占有更多实证资料的基础上，倪志伟1996年对市场转型论做出再次修正，提出“相对变化”的观点。他将全国区分为内地较传统的再分配经济、沿海再分配经济、沿海合作主义经济、沿海自由放任经济四类不同的经济类型，发现在所有四个类型中，企业主的收入回报都相当高，而干部的经济回报则没有那么多高^③。

2. 边燕杰、罗根的权力维系论

边燕杰与罗根(John Logan)研究了天津1978年到1993年改革进程及其收入变化，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1996年的《美国社会学评论》上，题目为《市场转型与权力继续：中国城市分层体系研究》。他们认为，在改革期间，中国两个核心制度安排，即共产党的领导和单位体制，仍然对城市分层体系有重要影响，这些制度安排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延续被改革过程所强化。

政治权力的继续在再分配和市场两种体制中都有体现。在再分配体制中，劳动报酬的分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在市场体制的条件下，政治权力之所以延续，是因为市场是在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下崛起、成长。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可以优先在市场体制中获得实惠。此外，市场机制往往是在再分配体制内部发育、成长、壮大的。

边燕杰与罗根关于天津的研究也发现支持市场转型论的资料。首

① Nee, V.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1989, pp. 663-681.

② Nee, V.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1991, pp. 267-282.

③ Nee, V.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996, pp. 908-949.

先,对年龄的收入回报在逐年递减,表明以再分配为体制背景的年资效应在减弱。其次,对教育的收入回报是逐年上升的。再次,对市场关联性高的职业的收入回报在1988年以后迅速提高。最后,对市场化或类市场化企业的经济回报在1993年超过了对任何其他类型单位的经济回报。这些结果表明,在双轨制经济中,权力和市场都是向上流动的渠道^①。

3. 白威廉和麦谊生的政治市场论

虽然在边燕杰与罗根之论中,再分配体制内已有市场产生的思想,但是他们的市场概念还是存留在经济市场的圈子里。白威廉(Parish)和麦谊生(Michelson)突破了 this 框架,大胆提出在经济市场发展过程中,转型经济中出现重要的政治市场。他们认为,注重经济、政治二元市场的结构和互动规律,是解开市场转型论争辩的关键。

白威廉和麦谊生指出政治市场的三种重要形式,即工人与干部的关系、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以及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他们认为,在市场改革的进程中,这三种关系都处于双方的讨价还价之中,讨价还价的双方的资源是政治性的。由于这些政治市场的关系影响着利益分配,并且影响着经济市场的运行,所以政治资源、政治权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将不会被贬值,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将会持续保持优势。

白威廉与麦谊生分析的资料是1988年的统计调查数据,他们反对倪志伟对沿海再分配经济的划分,也不同意倪志伟对干部的定义。在对地区和干部类别分类做调整后,白威廉与麦谊生重新分析了倪志伟1996年使用过的资料。结果发现,在所有四类地区,对干部的经济回报都是正向的。就收入绝对量而言,官员的收入优势截至1988年还未消失,而且,在更趋市场化的地区也未开始下降^②。

^① Bian, Y., Logan, J.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1996, pp. 739-758.

^② Parish, W. L., Michelson, E. "Politics and Markets: Dual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996, pp. 1042-1059.

4. 魏昂德的政府即厂商论

白威廉与麦谊生的政治市场论指出了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但政治市场的概念将政府排除在经济市场之外，魏昂德 1995 年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论文《政府即厂商》，阐述政府已是经济市场中的必要一员，因为地方政府已经从事经营，以厂商的角色参加市场活动。在经济活动中，本来作为球赛裁判的政府，现在已经作为球员参加球赛。

政府以裁判与球员的双重角色参加市场改革过程，引起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与市场转型和社会分层研究的关联有两个：一是，它解释了为什么政府的权力作为政治权力的重要形式在改革中的继续。参加市场活动不但成为政府发挥权力作用的机会，而且，政府通过参加市场和权力运作，为政府机构和官员直接获得经济回报。二是，不是所有政府都有同样的能力和刺激成为厂商。魏昂德认为，越是远离中央权力的政府越有能力成为厂商，因为远离中央权力不仅意味着自主权力的增强，还意味着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监控能力下降，地方政府有充分的刺激用很多方式将政府变为厂商。

远离中央权力并非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科层概念，所以级别低的县乡政府比级别高的省市政府更远离中央权力。魏昂德的实证分析发现，山东邹平相比天津，更远离中央，因而邹平在各种政府即厂商的指标上都超过天津^①。

5. 林南的地方市场社会主义论

林南在 1995 年发表论文《地方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地方法团主义实际运行》，以天津大邱庄为例，说明了地方政治权力结构不一定依市场转型而发生根本变化，是因为该结构的基础是家族网络。地方市场社会主义中的市场，指的是地方经济的协调机制是市场原则，即价格机制、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地方市场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从

^① 参见 Walder, A. G. "Local Government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995, pp. 263-301.

产权出发，指的是地方经济组织的产权管理主体不是私人，而是社区集体。运作这样一种市场化的集体经济，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结构。

林南发现，天津大邱庄从再分配性质的集体经济发展到市场化的集体经济，其政治权力结构未发生根本变化，主要领导人都未离职，新的领导人都是从老干部家族网络中提拔的。这一现象是对市场转型论的挑战，因为市场转型论预测，拥有再分配权力的干部应该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丧失权力基础，成为失败者。

林南认为，在天津大邱庄的案例中，政治权力结构能够超越市场经济体制，原因就是这一权力结构所依赖的基础是家族网络。家族网络的特征是它的继续性，因为家族关系是随代际传承而持续发展的，所以政治权力能够持续下去。因此，家族网络成为村落政治权力的基础，是转型经济中的重要现象^①。

6. 周雪光的政经共变论

周雪光 2000 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目为《中国城镇中的经济转型与收入不平等：来自追踪数据的发现》，试图综合有关国家社会主义转型争论的各种理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个概念模型来指导数据分析，这一概念模型就是“政治与市场共变”。周雪光认为，以往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转型的理论争论包含两种理论趋向：一是倪志伟等人强调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新的市场机制有取代旧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作用。二是市场转型论，反对者强调现有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作用，他们认为正在进行的转型和正在出现的经济制度和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纠缠在一起。周雪光认为两个方面都重要，应该把制度变迁看成是政治和经济制度共同变化的过程。

周雪光用“政治与市场共变”模型来描述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政治与市场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他指出，国家启动改革和市场推进是经济转型的两个主要动力源，这两个动力源促使政治和市场在互动过程中共

^① 参见 Lin, N.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24, 1995, pp. 301-354.

变。他采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这两者共变。依据这种理论，政治和市场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国家在建立制度规则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市场正是在这些制度规则中运作的。因此，市场扩张并不是一个自我演化的进程，相反，经济活动是嵌入在社会情境和历史变迁的路径之中的。在政治和市场共变的过程中，国家是一个活跃的行动者，并且带有自身利益和偏好。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制度的演变必然反映为相互竞争的利益和制度的妥协。

根据政治与市场共变的分析，周雪光对于传统市场转型理论有关再分配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区分提出了疑问。他指出，再分配国家的撤出并不意味着市场的推进。新制度的出现通常采取一种与现存规则、权威关系和可用的解决方案相结合的方式。因此，周雪光认为，要抛弃以往“老的”和“新的”制度标签，考虑被观察到的经济交易和新的制度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原则或政治原则所主导，以及它们以什么样的方式侵蚀、强化或转化了市场和政治，尤其是以什么特殊方式，“老的”和“新的”利益对规则制定过程施加了影响。只有通过这样的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优势和劣势的来源^①。

7. 国内学者对市场转型论的研究

关于市场转型对社会分层机制的影响，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学者对市场转型理论及其相关争论在中国转型社会中解释力的实证检验与发展；第二，中国学者对市场转型论及其相关争论的反思。

(1) 中国学者对市场转型论及其争论的实证检验与发展。

①宋时歌的权力转换延迟效应说。宋时歌认为，中国市场转型中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循环与再生。各社会不同的制度结构决定了各社会具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不同于苏联和东欧，而是创造了一种再分配经济与市

^① Zhou, X. "Market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2000, pp. 1035-1074.

场经济同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中国经济改革中“政权稳定与连续”以及“市场经济的扩展”导致了干部权力的延续。因为政府是改革的主导者和控制者，所以干部群体能够而且愿意将旧体制下的再分配权力转化为新环境下的形式，即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权力。在改革之初，干部因旧体制中巨大的既存利益而延缓了他们向市场经济转换的步伐。这种延缓使得社会下层能有机会填补经济市场中短暂的权力真空，成为新兴的经济精英。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展，干部会被市场经济中的巨大利益所吸引，一部分干部会迅速转向市场经济。随着权力被转换成经济利益，干部成为经济改革中新兴经济精英的主要来源。通过数据分析，宋时歌证实干部身份对私营企业主身份地位的获得具有极大促进作用，并且有明显的时间差异，而教育程度往往只是权力的附属品，不能起决定性作用^①。

②刘欣的权力衍变说。刘欣认为，权力精英一直在生活机遇中处于优势地位，权力转移论不能对此做出解释，权力持续论虽然预测到这一点，却未能对权力持续作用的机制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他在制度主义的基本前提设定下，提出了权力衍变说。他的制度主义基本前提设定是：社会分层作为制度化的不平等再生机制，总是嵌入在既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制度安排之中，并由这些基本制度安排来解释；在现代社会中，产权的所有制形式，以及国家权力与产权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像再分配、市场这样的经济整合制度，都是从基本制度安排中衍生出来的。在让利放权和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社会的产权制度和公有经济的委托—代理关系发生了变化。这种制度变化导致公共权力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公共权力衍生成权力精英的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有重要影响。基于权力衍变逻辑，刘欣提出三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权力持续论，指的是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公共权力作为再分配权力仍是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第二个命题是权力衍生论，

^① 参见宋时歌：《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